

# Is Modernization Alive or Dead? — Question the Kassel Documenta 2007

## 现代性是死了，还是活着——问 2007 卡塞尔文献展



### 1. 有建筑性的胡扯

当代神话学家约瑟夫·坎贝尔 (Joseph Campbell)，称詹姆斯·乔伊斯 (James Joyce) 那本充满死亡、复活、神话、变形、生活、意识的《芬尼根守灵记》是：“用没完没了的胡扯来帮我们的故乡爱尔兰施肥。”更多人指出，那是一本“在海上乱丢垃圾”或是“喋喋不休的道听涂说”。不过，没有人否认，爱尔兰和乔伊斯，都靠这具有建筑架构的垃圾文字而更加不朽。事实上，《芬尼根守灵记》不仅只为爱尔兰施肥，它更为现代主义施肥，同时还肥及了后现代主义。

2006年六月，收到德国文件大展的筹备新闻稿，遂想到不断在当代生活找寻新神话的约瑟夫·坎贝尔之语。这个联想绝对没有对当代艺术不敬，相反地，而是对所有可能的施肥者致敬。一个文学的乔伊斯不够，当代艺坛正在征召更多艺术的乔伊斯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想着要在许多投掷出的胡扯或高论中，寻找属于当代神话的意义，仿若已荣幸地成为肥水之战的一员，自然也要思考着一些具有建筑性的道听涂说，是如何地结合与分解。

针对论述权的被剥夺，艺术家们继2002年文件大展与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有了一些集众之声。2003年7月至10月，欧陆艺术家们出现反对之声。将近30位国际艺坛老中青三代，包括前世纪70年代的观念装置艺术家们丹尼尔·伯罕 (Daniel Buren) 与劳伦斯·威纳 (Lawrence Weiner) 等艺坛大老，曾在网站上进行对话，其主题便是“下届文件展应让

一位艺术家当总策划”。2007年文件三大主题的提出令人莞尔，它们以提问的方式，提供了一个公海，把表述权还给了艺术家。相对于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前期命题，即2002年的后殖民主义平行论，代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期命题，重新关注了当代人共同生活的面相，尤其，也包括了艺术家的面相。

### 2. 今日牝鸡不司晨

2007年文件大展由1962年出生柏林的策展人罗杰·布鲁格 (Roger M. Buegel) 和艺术史学者鲁斯·诺克 (Ruth Noack) 合作策划。早在2005年12月，在串连出各地作品之前，罗杰·布鲁格已先提出了足以反映当代艺术趋势的三大课题。作品还没有挑选展出，策展人的命题有什么意义呢？好比“鸡与鸡蛋”的前置和后设问题。反对策展主题存在的论者，认为每件作品已有艺术家的论见存在，实不需再做多余的主题贯穿工作，以免雀占鸠巢，曲扭艺术家原意。赞同策展主题存在的论者，认为许多当代作品，或许同质异地存在，能整理出主题脉络导向，有益更广面的导读。由于文件展每五年才举办一次，它的确需要先考察研究、制订主题才能确认作品。而此主题也往往与时代思潮有关，以便合于“视觉文件”的时间性。在此前提下，文件展的作品往往形成“鸡与鸡蛋”并置的现象。策展单位既是鸡场拾蛋者，同时也像生蛋的母鸡。一般人以为，这只牝鸡可以司晨，不管其主题是否一鸣惊人或陈腔滥调，当代艺坛总是会以“守灵”的精神，希望在一夕之后，看到年代生活的种种征兆或隐喻。

犹记2002年的文件大展，艺术界对策展人设定主题，理论先于作品的现象提出质疑，认为政治性领导了艺术性。2007年的文件大展主题，从善如流，改用问号的方式，将“司晨”的问题丢给了观众和艺术家。罗杰·布鲁格提出当代艺术的主旋律是绕着三个已是老生常谈的主题转，它们是如此寻常，但又是这么具代表性。它们是属于艺术家的思考范围，甚至还是艺术家的功课。带着一种近乎吟颂的态度，布鲁格用音乐的旋律样态 (Leitmotifs)，形容它们在展览里出

现的频律，总是这里那里的到处出现，或交迭或响应或分散，抑扬顿挫中主调于焉形成。对以为文件大展将出现大论述的读者而言，这三个主题也是一项非常幽默的提问，它们犹如“用没完没了的诘问帮我们的当代艺坛施肥。”试图用基本问题再掀出一波新浪花。这三大议题是：现代性过时了吗？什么是真实的生命呢？什么是该作到的呢？

### 3. 现代性是死了，还是活着？

第一个问题是：现代性过时了吗？(Is modernity our antiquity?) “antiquity”这个被当作“古时候”的用词，有正负两个意思，一则表示已成为具影响性的内在传承；一则表示已不足为维持当代前进的落后物。至今，没有人知道，现代性是死了，还是仍活着。在有的人还未理清什么是“现代性”之际，有人已宣告现代性有前后之分，也有人认为它已经在20世纪的专制灾难中阵亡了。有没有觉得这像是一则正义严词的谣言呢？传说，与日俱增的自然或人为灾难、被瓦解的殖民文化、以及新兴的生活危机，迫使现代性成为过时的人文供品。对想象力仍然充满着现代性的艺术家来说，他们也过时了吗？当一座源自包豪斯的当代建物，被诠释成“认同”或“文化”的产物时，建物内的人究竟是现代性内的人或是现代性外的人呢？是人不在里外，抑或里外不是人？用21世纪的眼光来看，20世纪现代性仍充满如此致命的暴力和吸引力，能在生生死死中自我颠覆内爆不息。文件大展的新野心是，用这反诘后的自信，设想为死去的人或仍活着的人，在“现代性”里找到共有生态的平行视野。从语词上看，所要证明的，应该是“现代性还活着。”

### 4. 你的痛苦，我的愉悦？

第二个问题是：什么是真实的生命？(What is bare life?) 这个探讨存在 (being) 的哲学命题涵括性极广，但所涉的却又是非常根本的生存问题。它可能关乎性情、梦境、心理、意识的愉悦与痛苦，也可能是基本生存的保障。文件大展的关照面向来庞大，政治和战争

所带给人们的生存威胁，还有人际的自由度与人和自然的新关系，在今日仍然犹新地成为人们生命存有的思考向度。当代艺术家，显然努力在表述痛苦主题与愉悦尺度的理智区隔，但2007年文件大展对喋喋不休的艺术表现提出一问：“这些作品，对阅读者而言，意义何在？”这个思考，也让人想起柏拉图在《共和国》一书中的第七章，有关“洞穴人”的经验和知识的真实差距。艺术讯息若来自艺术家的经验，那么观众如何去体验那份真实？艺术观赏已变成由上对下的教育或教化了吗？

### 5. 什么是必需做的？

第三个问题，正是回归到艺术家的养成和当代艺术教育上的思考层面。艺术该做到的是什么呢？(What is to be done?) 艺术家以形式和主题做自我的教育，观者以美感的经验做自我的教育。作为一个展览机制，如文件展之位置，如何在挑战中，以尊重而不损艺术家已见的状态下，能明确地整合出整体性呢？这个三方位的反思，使文件大展仍然掌握到“理论势必存在”的制高点。全球化的文化转译情结，已使艺术进入一个无法规避的公共论坛。罗杰·布鲁格用德文的“教育”来解释当代艺术与公共教育的特殊关系。他称德文之“教育”一词，包括了“世代”或“根基”的意思；但今日，“教育”一词却也包括了被污名化的邪恶意味，如权威、学阀、恋物癖等印象。意犹未尽，这些问题，最后将由来自全世界的参展艺术家们，个别在2007年六月回应。What is to be done? 没有指称出“谁”要去完成该做的工程，但无论是指艺坛或艺术家的工作，这问题已呈现出一个客气的质询：我们各位，能为社会做什么？

2007年文件三问是一篇开放的论述，但这次，主办单位把答复权交给了艺术家。为什么大会会选那些艺术家来答复这些长期已存在的问题呢？其扶选动作，不得已地又要扮演了“决定”的权威角色。至于观众，或许必需相信，就像阅读《芬尼根守灵记》那本书，相信所有浮游于海的文字，一定会汇集出时代的声音。你可以说那是“喋喋不休的道听涂说”，但是不能不说，那也是一种对年代的施肥方法。